

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

——以陶鬲为例

◆ 牛世山

◆ 岳洪彬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 岳占伟

摘要:以殷墟遗址晚商遗存为代表的殷墟文化,文化风格具有浓厚的多元特点,主要通过陶质类器物上表现出来。本文根据殷墟遗址的有关新发现,以陶鬲为例,讨论了殷墟文化的多样性。首先按考古分类标准将陶鬲分为三大类、38型,又按文化风格的差异重新分为17组。以殷墟文化陶器的类型和群组的分析为基础,探讨了殷墟商文化与商考古学文化其他类型、商考古学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等。

关键词:殷墟文化;陶鬲;分类;文化风格;文化关系

Abstract: The Yinxu culture, as represented by late Shang remains at Yinxu, exhibits a great diversity of cultural styles, primarily manifest in pottery vessels. Based on new findings from Yinxu, this article takes li tripod as an example to discuss the cultural diversity at Yinxu. First, using techniques of archaeological typology, we classify li into 3 types and 38 varieties. Then, the li tripods are reclassified into 17 groups in terms of cultural styles. Drawing upon such classification, this work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onnections of the Yinxu culture with other Shang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hang and neighboring Bronze Age cultures.

Key Words: Yinxu culture, pottery li-tripod, typology, cultural style, cultural relation

以殷墟遗址晚商遗存为代表的殷墟文化,是商代晚期的商考古学文化的代表。殷墟文化的主要物质形态,包括各类遗迹(房址、作坊、水井、窖穴、墓葬、陪葬坑和祭祀坑等)和遗物(甲骨、青铜和铅器、陶质类器、玉石器、骨角牙蚌器以及人和动物骨骼等),但其中最丰富、富于变化的是各类遗物,尤其是陶、铜质类容器,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文化特点。学界以殷墟文化的典型内涵为标尺,通过对殷墟文化多样性的探讨,在理清殷墟文化构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殷墟类型商文化与商文化其他类型以及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关系,并探讨商朝晚期都城大邑商与其他地区的人或人群的联系,由此获知大邑商、商朝历史和文化的丰富信息。

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文化因素往往具有多元特点,其中既有处于主导地位的因素,还往往有一些处于

从属地位的因素^①。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或多样性特点,主要从陶质类器物上呈现出来,笔者曾做过讨论^②。近年来,在田野考古和室内资料整理中,新发现一些非典型殷墟文化风格的标本,其中基本是陶鬲^③。本文根据殷墟遗址的有关新发现,对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作讨论。

一、殷墟文化陶鬲的分类

陶器是新石器时代到汉代,包括殷墟文化在内的古代遗存中出土最多的遗物。陶质类器物的考古类型分类主要有两个角度,一是基于生产原料及质地、陶色等要素分类(如普通陶器或粗泥陶、白陶、硬陶、原始瓷和釉陶等),二是基于器物形态及使用功能的分类。考古分类的操作中,往往结合两个方面作综合

分类。

陶鬲是殷墟文化中数量最多的几类器物之一。基本为加砂陶,极少数为泥质陶,多为灰陶,有关殷墟遗址的考古报告、简报中多对其作了类型学分类研究。结合近十多年来的殷墟多个地点如大司空(豫北纱厂)^④、孝民屯^⑤等地点的考古发掘,可见殷墟陶鬲的形态多样,且富于变化,是进行考古学分类研究和进一步探讨其他问题的典型对象。近年来,我们在田野考古发掘和为编撰《殷墟出土陶器》而对以往考古资料的整理中,新发现一些殷墟文化的非典型文化因素的标本,由此获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下文以笔者参与撰写的《安阳孝民屯》考古报告的分类为基础作系统介绍。

殷墟文化陶鬲按形体分大、中、小三类,大的体高、口大,夹砂陶,陶胎明显厚;体表常饰绳纹,有的还有附加堆纹以加固器体;口径多超过 30 厘米。中型为中体,多为夹砂陶,极少数为未经淘洗的黄土烧制的泥质陶^⑥;体表常饰绳纹,口径在 20—26 厘米之间;形态多样。小型的体小,为泥质陶,体表素面或磨光。

(1)大型鬲 分三型。

A 型 方体或扁体,盘口,口内微凹,卷沿。裆较低或低裆,实足较低或无实足。如孝民屯 H600:20(图一:5)。

B 型 体近 A 型,腹部有附加堆纹。

C 型 宽折沿,束颈较高,柱状足。如孝民屯 H202:47^⑦(图五:10)。

(2)中型鬲 分 34 型。

A 型 常见。侈口或盘口,折沿或卷沿,翻缘方唇,袋腹较鼓或微鼓,分裆。腹部饰绳纹,足跟部素面。分三亚型:

Aa 型:最常见。口径多在 20 厘米左右。盘口,口内微凹。卷沿或折沿。如大司空 H317:38^⑧(图一:4)。

Ab 型:侈口,折沿或卷沿,沿较直,方唇或唇近方。其他特征同 Aa 型。如大司空 H326:63^⑨(图一:8)。

Ac 型:侈口,折沿或沿近折,沿面微凹,沿以下器壁普遍较厚,陶色多为褐色。其他特征同 Aa 型。如孝民屯 H505:2(图二:1)。

B 型 夹砂陶。体饰附加堆纹,即鬲纹,其他特征近 A 型鬲。如武官北地 M1:23^⑩(图一:1)。

C 型 折沿,颈以下到上腹间有宽素面带。其他特征近 A 型鬲。如小屯 H136:38^⑪(图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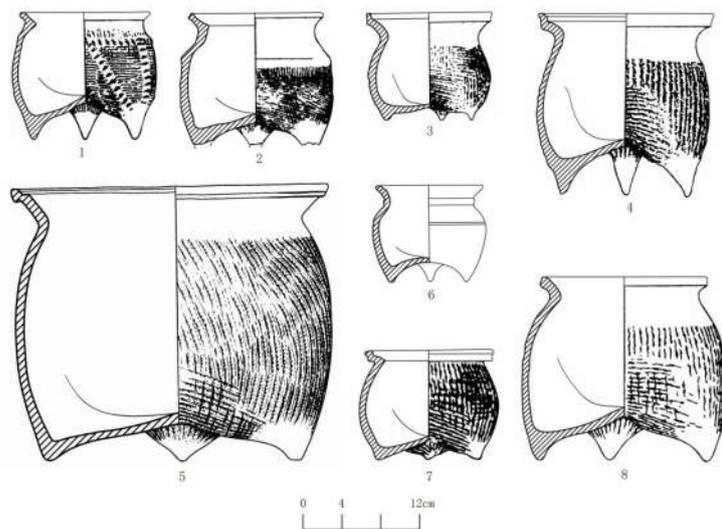
D 型 折沿很短、近平,沿面两道弦纹。其他特征近 Aa 型鬲。如孝民屯 H202:150(图五:1)。

E 型 卷沿或折沿,沿很短、斜立,翻缘宽方唇。如苗圃北地 H25:42(图二:3)、安钢大道 H26:1^⑫。

F 型 束颈,折肩。其他特征近 Aa 型鬲。如苗圃北地 T101^⑬A:51^⑭(图一:2)。

G 型 体较小,口径 16 厘米左右。包括两种,一种为夹砂陶,除形体较小外,其他特征几乎同 Aa 型鬲;一种用生黄土制作,形态近于 Aa 型鬲,只是始终有矮足。如孝民屯 T1^⑮③:619^⑯(图一:7)。

H 型 多为泥质陶,少数为夹砂陶,大多为红或红褐色。多敞口,高卷领,束颈。体普遍较小,口径 15



图一 A 组陶鬲

1.中型 B 型(M1:23) 2.中型 F 型(T101 ④ A:51) 3.中型 I 型(M241:1) 4.中型 Aa 型(H317:38) 5.大型 A 型(H600:20) 6.小型(M237:1) 7.中型 G 型(T1 ③ :619) 8.中型 Ab 型(H326:63)(1 为武官北地,2、6 为苗圃北地,3 为小屯西地,4、8 为大司空,5、7 为孝民屯出土)

厘米左右,少数口径略大。其他特征近 Aa 型鬲。如大司空 M127:3^⑤(图三:2)。

I 型 多为生黄土制作,少数为夹砂陶,大多为红或红褐色。多为盘口,短卷领,束颈,矮足。体普遍较小,口径 15 厘米左右,少数口径略大。袋腹多饰细绳纹。其他特征近 A 型鬲。如小屯西地 M241:1^⑥(图一:3)

J 型 侈口,卷沿,沿极短。其他特征近 A 型鬲。

K 型 体瘦高,口沿以下近筒形,侈口,折沿或沿近折,斜立,弧裆较宽,裆上微瘪。足粗大,足、腹局限较清晰。如孝民屯 F26-2:12(图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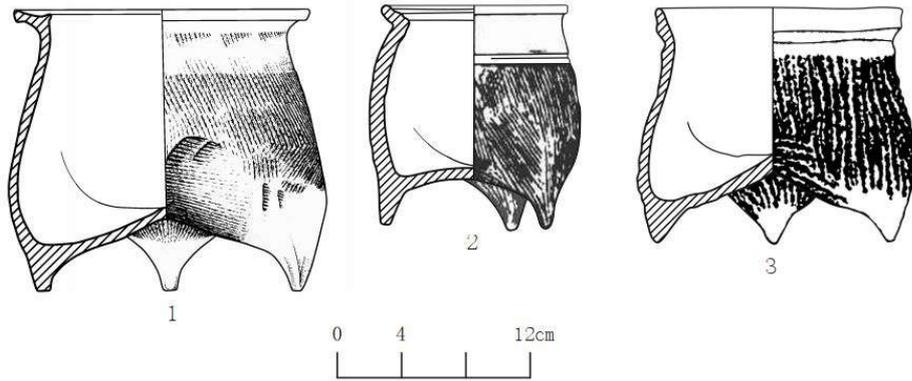
L 型 卷领,裆较高,乳状袋足,袋腹最宽处偏下,无实足。口缘部或有花边。如孝民屯 M776:3^⑦(图六:2)。

M 型 卷领,高裆,乳状袋足,袋腹最宽处近中腹,无实足。领外或有花边堆纹。如孝民屯 G14:2^⑧(图四:7)。

N 型 高体,侈口,短折沿,袋腹深,实足很矮。如孝民屯 F106-1:2^⑨(图四: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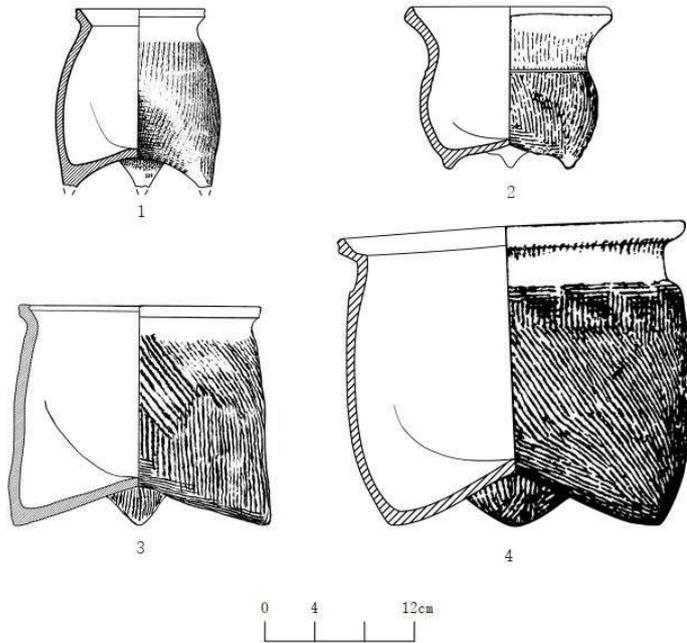
O 型 高体,侈口,卷沿,袋腹深,裆较低,柱足较高。如孝民屯 H36:1^⑩(图五:4)。

P 型 体近方,侈口,折沿,袋腹较深,低裆,无实



图二 B、C、D 组中型陶鬲

1.Ac 型(H505:2) 2.C 型(H136:38) 3.E 型(H25:42)(1.B 组,2.C 组,3.D 组)(1 为孝民屯,2 为小屯,3 为苗圃北地出土)



图三 E、F、G、H 组中型陶鬲

1.K 型(F26-2:12) 2.H 型(M127:3) 3.AB 型(H314:12) 4.P 型(H10:29)(1.H 组,2.E 组,3.F 组,4.G 组)(1 为孝民屯,2 为大司空,3 为大司空[豫北纱厂],4 为后岗出土)

足或几无实足。其他特征近 Aa 型鬲。如后岗 H10:29^② (图三:3)。

Q 型 体较小,侈口,短折沿近平,袋腹较鼓,裆较低,实足较矮。袋腹、足都饰绳纹。如孝民屯 H315:15^② (图五:3)

R 型 体较小,侈口,沿近折,袋腹较直,裆较低,几无实足。袋腹、足都饰绳纹。如孝民屯 T1906^⑤:4 (图五:7)。

S 型 高卷领,折肩。领上多道弦纹。如小屯南地 H32:1^② (图六:3)、孝民屯 T2711(15):27 (图四:7)。

T 型 敛口,无沿。其他特征近 Aa 型鬲。

U 型 折沿或沿近折,裆上微瘪,弧裆,通体饰绳纹。如孝民屯 H12:76^④ (图四:6)、T2212^⑤:14 (图五:9)、刘家庄北地 H102:6^⑤。

V 型 侈口,卷沿较长,体饰横绳纹,其他特征同 Aa 型。如孝民屯 H416:4 (图五:5)、1970AWM3:2^② (图六:4)。

W 型 直口,口外略下带鬲。素面。如孝民屯 F113:3 (图四:1)。

X 型 短领,袋足,裆较高。领部带鬲,体饰较整齐的绳纹。如孝民屯 T1906^⑤:25 (图四:3)

Y 型 仿铜鬲。如大司空(豫北纱厂)H16:31^② (图六:1)。

Z 型 褐陶,体素面。如小屯 H8:9^② (图四:2)、铁路林场 H129:1^②、体育馆 H88:1^③。

AA 型 花边双耳袋足鬲,如小屯西地 H54:10^② (图六:6)。

AB 型 侈口,袋腹侧面直,无实足,腹、足饰绳纹。如大司空(豫北纱厂)H314:12^② (图三:3)。

AC 型 领较高、直,袋腹中部折而成肩,裆较低,锥足较高。袋腹部饰较粗的绳纹,较浅。如大司空(豫北纱厂)T305^⑤B:1^③ (图六:7)、夹沙红褐陶;大司空(豫北纱厂)M1131:1^③,泥质灰陶。

AD 型 短领斜立,侈口,折沿平、极短,体侧腹壁直,裆较矮,锥足较高、较粗。体素面,袋腹、足的局部隐现中绳纹。如孝民屯东南地 GM1229:4^④ (图六:5)。

AE 型 沿近折、斜立,锥足矮,体通饰绳纹。如小屯南地 H37:7^③ (图六:8)、小屯北地 F10:32^② (图六:9)。

AF 型 卷沿,上腹素面,柱足较粗。如大司空(豫北纱厂)M442:3^③ (图五: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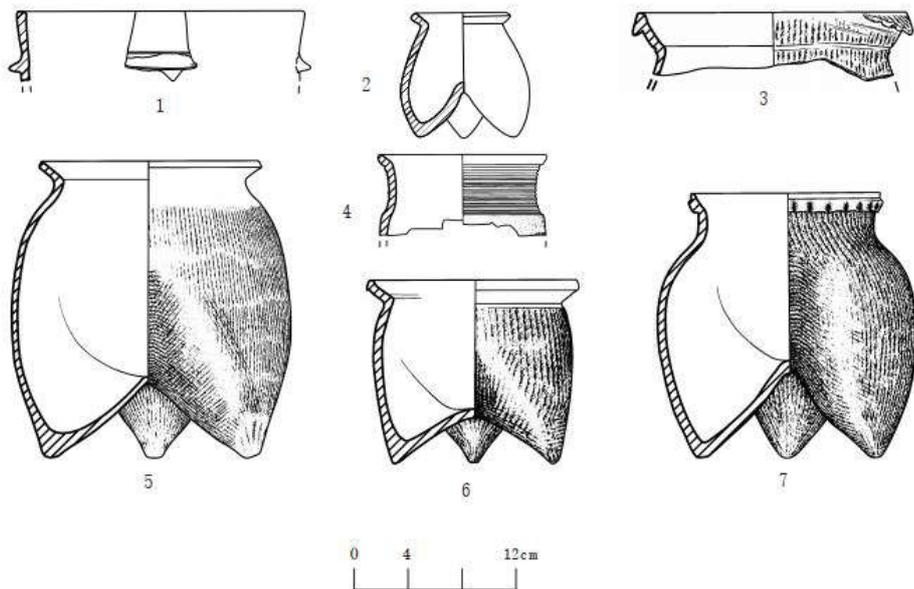
AG 型 折沿,颈部较宽,内收。如苗圃北地 M209:1^③ (图五:8)。

AH 型 沿折沿,袋腹较深,锥足矮。通体饰绳纹。如大司空(豫北纱厂)M111:3^④ (图五:2)。

AI 型 折沿,束颈,柱足。颈下一周附加堆纹。如大司空(豫北纱厂)H91^④:1^④ (图五: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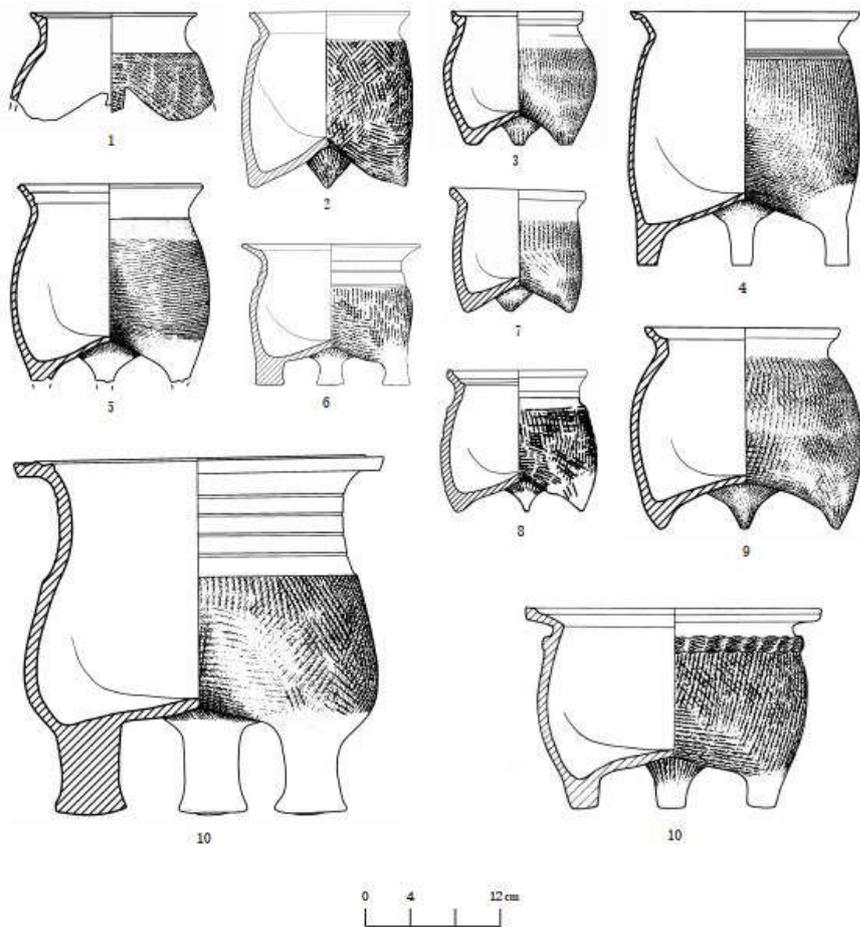
(3)小型鬲 丙类鬲 泥质陶。小体,素面,体表或磨光。如苗圃北地 M237:1 (图一:6)。

以上介绍可见,殷墟遗址中殷墟文化的陶鬲类型是很多的,可分为三大类、38 型,这些大体涵盖了殷墟遗址已发现陶鬲的各种形态。但殷墟文化陶鬲肯定不会限于这些已知的类型,需要今后在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中详加关注和甄别。



图四 I-P 组中型陶鬲

1.W 型(F113:3) 2.Z 型(H8:9) 3.X 型(T1906^⑤:25) 4.S 型(T2711(15):27) 5.N 型(F106-1:2) 6.U 型(H12:76) 7.M 型(F104-3:1)(1.J 组,2.P 组,3.O 组,4.M 组,5.K 组,6.L 组,7.I 组)(孝民屯出土)



图五 不明来源陶鬲

1.中型 D 型(H202:150) 2.中型 AH 型(M111:3) 3.中型 Q 型(H315:15) 4.中型 O 型(H36:1) 5.中型 V 型(H416:4) 6.中型 AF 型(M442:3) 7.中型 R 型(T1906 ⑤ :4) 8.中型 AG 型(PNM209:1) 9.中型 U 型(T2212 ⑤ :14) 10.大型 C 型(H202:47) 11.AI 型(H91 ④ :1)(2、6、11 为大司空, 8 为苗圃北地, 余为孝民屯出土)

二、陶鬲所见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

对考古学文化多元因素的探讨,是将考古学类型学分类的各类对象,以文化风格为视角、按文化风格的异同重新分为不同的组。笔者曾将殷墟文化的因素分为 A-N 等 14 组和暂不明来源组等多类^④,本文新增 O-Q 等 3 组(图七)。下面以前面划分的陶鬲类型为基础,按组别作比较详细的讨论。

A 组

代表性器物有大型鬲 A、B 型、中型 Aa、Ab、B、F、G、I、J、T、Y 型、小型鬲。殷墟遗址的这些类型大多有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序列,演变轨迹清晰,共出频率高。

B 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Ac 型。在殷墟遗址中,B 组的数量,在所有组别中是除 A、N 组以外最多的,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此型鬲在以荥阳关帝庙遗址^⑤

为代表的郑州、许昌地区晚商文化中很多,是其标志性器物。以往有关研究未将郑州、许昌地区的晚商文化独立列为新的类型,现在看来,将其独立为一个类型是非常合适的。

C 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C 型,本组器物鬲见于河南登封^⑥一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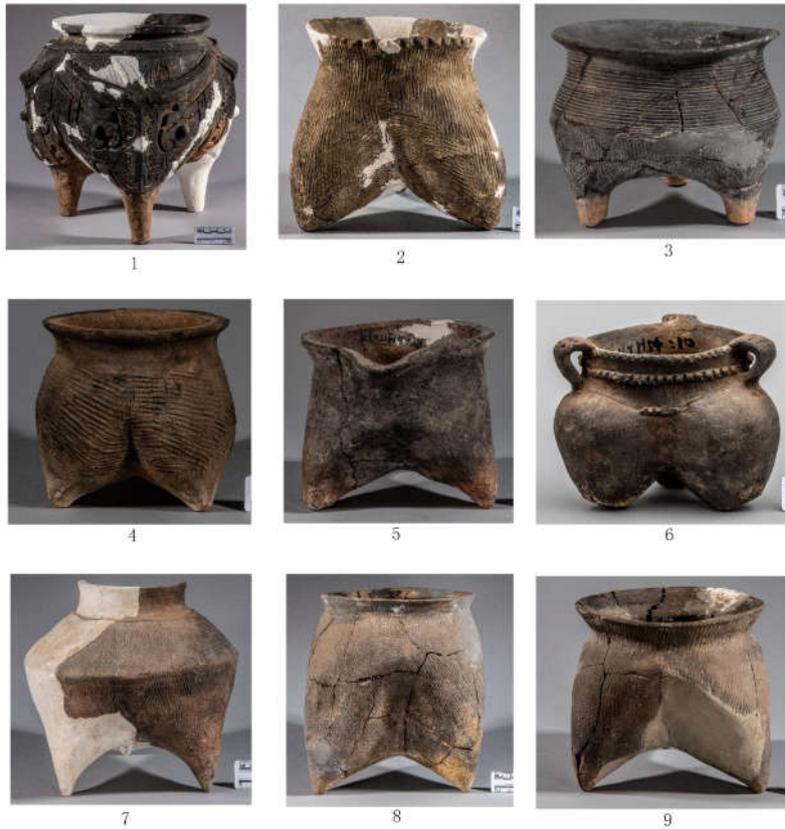
D 组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E 型。本组因素在殷墟文化中虽然不多,但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本组是豫东、鲁西南一带的晚商文化安邱类型的典型器物^⑦。

E 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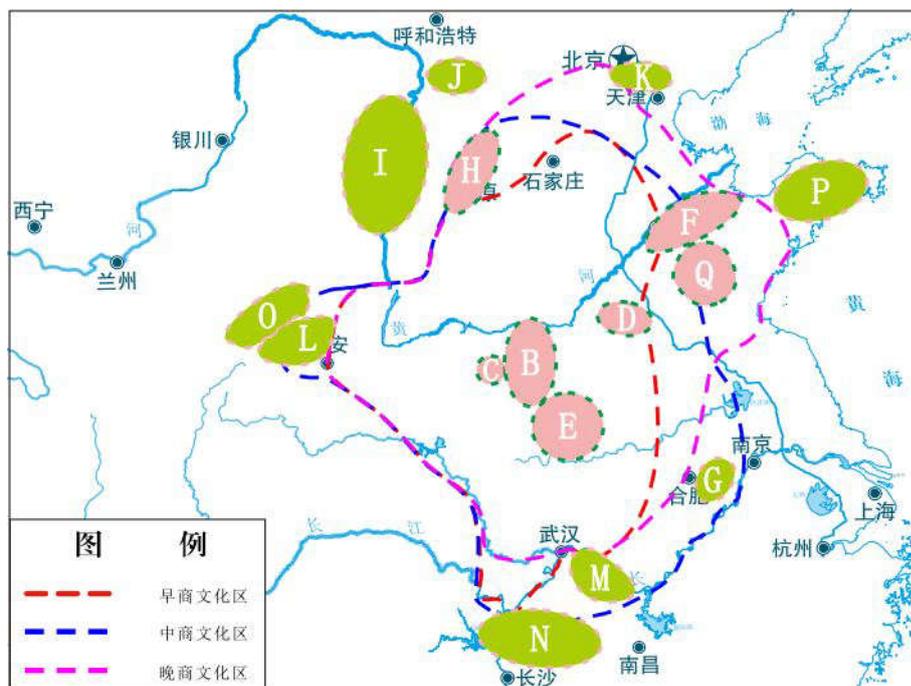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H 型。本组因素在殷墟文化第 3 期才出现,在殷墟 3-4 期中有一定数量。本组是豫南一带的晚商文化的标志性陶鬲,如在河南正阳闰楼^⑧、罗山天湖晚商墓地^⑨等重要遗址多有出土。

F 组



图六 殷墟文化部分中型陶鬲的分型与分组

1.Y 型 (H16:31) 2.L 型 (M776:3) 3.S 型 (H32:1) 4.V 型 (M3:2) 5.AD 型 (M1229:4) 6.AA 型 (H54:10) 7.AC 型 (T305 ⑤ B:1) 8.AE 型 (H37:7) 9.AE 型 (F10:32) (1.A 组, 2.I 组, 3.M 组, 5.P 组, 6.R 组, 7.Q 组, 4, 8, 9. 未知来源组) (1, 7 为大司空 [豫北纱厂], 2 为孝民屯, 3, 8 为小屯南地, 4 为未知地点, 5 为孝民屯东南地, 6 为安钢, 9 为小屯北地出土)



图七 殷墟文化 B-P 组来源示意图

代表性器型为中型鬲 AB 型,少见。此型鬲见于山东泰山山脉以北的晚商文化,如山东昌乐^④、平阴朱家桥^④等地。

G 组

代表性器物为中型鬲 P 型,少见。此型鬲见于安徽境内江淮流域的商代晚期文化,如含山大城墩遗址有此类陶鬲^④。这类文化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被很多研究者定性为商考古学文化,实际与后者差别明显,在族属层面是否属于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H 组

有中型 K 型鬲,集中见于殷墟一期晚段。源自以山西汾阳杏花村第六期遗存^④为代表的晋中盆地的晚商文化。

I 组

有中型鬲 L、M 型,少见。可辨识度高,源自晋陕高原的青铜文化。其中鬲见于山西柳林市高红^④、清涧县李家崖^④等遗址。

J 组

有中型鬲 W 型,少见。此器形态特殊,可资比较者,是晋西北一带的西岔文化^④。西岔文化是本世纪初确认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分布于黄河“几”字形拐弯东北的内蒙古清水河县一带。

K 组

有中型鬲 N 型,少见。源自京津地区、燕山南麓的大坨头文化^④。河北大厂县大坨头^④、北京房山刘家店^④都有此类器物出土。

L 组

有中型鬲 U 型标本 H12:76, 少见。为周式联裆鬲。常见于以武功郑家坡遗址^④为代表的先周文化。

M 组

有中型鬲 S 型,少见。笔者曾认为 S 型鬲源于江西赣江流域的吴城文化,如樟树市吴城^④、新干县大洋洲^④都有大量出土。实际上,更具可比性的是以蕲春毛家咀^④为代表湖北东部晚商遗存的陶鬲^④,殷墟此类鬲应该源于后者。

N 组

本组没有鬲,为硬陶、原始瓷和釉陶质的甗、罐及器盖等。为反映殷墟文化文化的多样性特点,附记于此。

O 组

有中型鬲 X、AA 型,即高领袋足鬲,少见。后者为以扶风刘家墓^④为代表的刘家文化的典型鬲。笔者曾将此型归于 L 组,因为考虑到此型鬲在殷墟遗址中出现于殷墟 4 期偏早时期,此时刘家文化已基

本融于先周文化中。但此型鬲为刘家文化的标志性器物,故此独立为一组。

P 组

有中型鬲 Z 型、AD 型,少见。此类鬲多见于山东胶东半岛的珍珠门文化^④。

Q 组

有中型鬲 AC 型。此型器物常见于山东南部晚商文化前掌大类型,如滕州前掌大墓地^④,不仅有形态近似 AC 型的带耳鬲或甗,还有盃的形态也很相似;另在山东北部的晚商文化中也有发现,如青州苏埠屯 M11:1^④。

此外,其他还有一些形制特殊的陶鬲显然非殷墟文化固有,应该也是外来的,但暂不明来源。包括大型 C 型、中型 D、O、Q、R、U 型标本 T2212^⑤:14、V、AE、AF、AG、AH、AI 型,这些器型很多可能并非出于一源,而是多源的,每个标本或许分别代表一组。其中如 O 型(H36:1),整体特点具有南方江汉流域商周时代陶鬲的风格,但尚无找到可对比的对象。

以上各组,基本涵盖了以陶鬲为核心的殷墟文化群组及其特点。细加考察,这些群组间还存在一定差异。

以数量计,前述各组以 A 组最多,其他群组各自的器型及其数量明显少。A 组不仅器型多,数量也多,以 A 组陶鬲为核心的文化因素在整个殷墟文化中明显居于主导地位,其他各组因素则处于次要地位。此外,处于次要地位的各组间也有一定差别,其中 B 组的数量是除 A、N 组以外最多的,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D 组也与 B 组类似,几乎见于殷墟各个时期,但数量不及 B 组多。其他组则见于殷墟某期或少数期、段,数量也很少。

通过安阳出土殷商陶器的 77 个样品(其中洹北商城、殷墟共 74 例)的岩相学分析,A 组样品与安阳本地黄土(包括次生黄土)、冲积土有对应关系,证明为本地生产;A 组以外的其他样品的检测分析结果都不同于 A 组样品,可证非本地生产,而且各组互不相同^④。这个分析可证,我们对殷墟陶器的类型学分类和基于文化风格的分组是合理的,认识也是客观的。

从各型陶鬲的流行地域看,殷墟文化 A 组鬲常见于以殷墟遗址为代表的晚商文化殷墟类型,其他各组,除 C 组外,或分别流行于商考古学文化其他类型,或分别常见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换言之,A 组是殷墟文化固有的典型文化因素,其他各组是殷墟文化的非典型文化因素,再加上暂不明来源组,可将殷墟文化各组归为典型殷墟文化风格(A 组)、非典型殷墟文化风格(B-Q 组)、暂不明来源组三大

类。

上文可见,殷墟文化的非典型风格陶器群组是很多的。它们出现在殷墟遗址,恐怕不能仅简单以文化交流来解释。这些非典型群组的主要器类是陶鬲,它们应多是人们从各地来到商王都旅途中和居地的炊具,如带有“旅鬲”“旅甗”“旅鼎”一样,就像有铭文周代青铜器的性质一样。所以,根据殷墟文化这些不同风格的群组,不仅可探讨殷墟文化与周边商文化其他类型、商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还可探讨商王都与其他地区间人群的互动关系。

以往有关商文化的研究中,很多研究基于典型商考古学文化遗存讨论商文化的扩张和向外传播,研究者对商文化的对外辐射力印象很深。通过殷墟都城遗址中各种文化风格因素的辨识,可见很多地区文化因素汇聚于商王都的现象,这是以往较少注意的,需一今后引起更多关注。只有全面考察商考古学文化与周边其他考古学文化间辐射与汇聚的双向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商文化、商王朝及其与周边其他文化和族群的关系。

三、结语

殷墟陶鬲的形态多样,考古分类可分为三大类,38型,按文化风格的不同又可细分为17组以上。包括陶鬲在内,殷墟出土的殷商文化陶器种类之繁、文化风格之多,远多于一般普通遗址,这可视为殷商王都这种大型都邑的特征之一。以殷墟文化陶器的类型和群组的分析为基础,可进一步探讨殷墟文化的内部构成以及形成、变化过程,也可探讨殷墟商文化与商考古学文化其他类型、商考古学文化与周边青铜文化的关系以及当时不同地区人群的互动关系等。

注释:

①a. 李伯谦:《论文化因素分析方法》,《中国文物报》1988年11月4日,后收入李伯谦:《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科学出版社,1998年; b. 俞伟超:《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一集),荆楚书社,1987年。

②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③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

年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

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殷商遗物卷,2014年交付文物出版社,待出版。后文涉及孝民屯的资料不再注出。

⑥下文中未特别注明者,均为加砂陶。

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21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九九:1,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九九:2,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六七:2,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图五三:23,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

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66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〇一:12,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⑭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〇一:10,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六八:4,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六八:5,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⑰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孝民屯(四):殷商遗存·墓葬》图2-4B、彩版三:3,文物出版社,2018年。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110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49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64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17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二〇二:2,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31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12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92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126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47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67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㉘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小屯》,图六二:24,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84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年。

⑲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99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98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81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㉒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八一:1、图一二九:2,文物出版社,2014年。

㉓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10页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396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261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118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出土陶器》,第328页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二九〇:7,文物出版社,2014年。

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发掘报告》,图一六七:5,文物出版社,1987年。

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二九〇:4,文物出版社,2014年。

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大司空——2004年发掘报告》,图一二九〇:6,文物出版社,2014年。

㉜牛世山:《殷墟文化的多样性——以陶质类容器为视角》,《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7年。

㉝a.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市关帝庙遗址商代晚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2008年第7期;b.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考古发现与认识》,《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

㉞郑州大学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心:《登封阳洼》,第660页图4-41:5,2014年。

㉟a.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东省菏泽地区展览馆、山东省菏泽市文化馆:《菏泽安邱堽堆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1期;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六章第二节“安邱类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㊱刘文阁、余新宏、刘群、李安娜:《河南正阳闰楼商代墓地》,《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9),文物出版社,2010年。

㊲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河南省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天湖商周墓地》,第177页图二四:2,《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

㊳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昌乐县图书馆:《山东昌乐县邹家庄遗址发掘简报》,图四:5,《考古》1987年第5期。

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图六:1,《考古》1961年第2期。

㊵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大城墩遗址发掘报告》,第94页图九:15,《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学出版社,1989年。

㊶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

㊷a. 国家文物局、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晋中考古》,图七一:1,文物出版社,1998年;b. 王京燕、高继平:《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第137页图,《发现中国:2007年100个重要考古新发现》,学苑出版社,2008年。

㊸张映文、李智荣:《陕西清涧县李家崖古城址发掘简报》,第51页图七:13、18,《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㊹a.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清水河县文物管理所:《清水河县西岔遗址发掘简报》,《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报告集》,远方出版社,2001年;b. 曹建恩:《清水河县碓臼沟遗址调查简报》,《万家寨水利枢纽工程报告集》,远方出版社,2001年。

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八章第八节“大坨头文化”。

㊻天津市文化局考古发掘队:《河北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坨头遗址试掘简报》,图三:2,《考古》1966年第1期。

㊼赵信、田敬东:《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层文化墓葬》,图三:2,《考古》1976年第1期。

㊽宝鸡市考古工作队:《武功郑家坡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㊾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吴城——1973-2002年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5年。

㊿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干县博物馆:《新干商代大墓》,文物出版社,1997年。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发掘队:《湖北薪春毛家咀西周木构建筑》,《考古》1962年第1期;b. 洪刚:《楚式鬲与刻槽鬲文化因素分析》,《鄂东考古发现与研究》,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年。

㋁本所同仁李宏飞博士与笔者交流时指出。

㋂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刘家姜戎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第7期。

㋃a. 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b. 张江凯:《长岛县珍珠门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84),文物出版社,1984年;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八章第一节“珍珠门文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图一〇九:1、2,文物出版社,2005年。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青州市博物馆:《青州市苏埠屯商代墓地发掘报告》,图一四:3,《海岱考古》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

㋆James Stoltman、荆志淳、唐际根、George (Rip) Rapp:《商代陶器生产——殷墟、洹北商城出土陶器的岩相学分析》,荆志淳、唐际根、高嶋谦一主编:《多维视域——商王朝与中国早期文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8年。A组以外的样品主要采自孝民屯地点,未刊布。